

国别与地区

哈马斯的宗教政治特性与其斗争策略的调整

郭依峰

[摘要] 哈马斯是一个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组织,其策略既受到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又与巴以和平进程密切相关。哈马斯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其斗争策略,特别是在大选获胜后哈马斯斗争策略的调整力度加强,在未来的中东和平进程中,哈马斯会结合其宗教理念在政治上继续调整其策略,以适应中东复杂的形势。

[关键词] 哈马斯;宗教政治特性;巴以冲突;策略调整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9)06-0066-71

哈马斯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其策略会深深地打上政治伊斯兰的烙印,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组织。这些特性决定了它在为巴勒斯坦的独立而斗争的过程中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会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策略。

一、哈马斯的宗教政治特性

哈马斯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简称,是巴勒斯坦一个宗教性的政治组织,其创始人和精神领袖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1987年12月,巴勒斯坦人民在加沙发动了大规模起义,自发的群众反抗斗争迅速地扩展到西岸,震撼了以色列的军事占领。12月14日,哈马斯应运而生。

哈马斯本质上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政治组织,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哈马斯宪章》中。1988年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广泛散发了著名的《哈马斯宪章》。这份共有36条款的宪章使用的完全是伊斯兰教语言,多次提到《古兰经》、真主、先知,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斗争纲领。^[1]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1)哈马斯的指导原则是神圣的伊斯兰教,是穆斯林兄弟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组织,也是世界性伊斯兰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哈马斯反对世俗的

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宪章称哈马斯的口号是:真主是它的最终目的,先知是它的榜样,《古兰经》是它的宪法,圣战是它的道路,为真主而献身是它最崇高的理想。(2)哈马斯的斗争目标是在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它强调,整个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伊斯兰的“瓦格夫”(神圣教产),任何一部分都是不可放弃的。信仰其它宗教的人必须在服从伊斯兰教的前提下才能在巴勒斯坦存在。(3)哈马斯致力于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敌人,解放巴勒斯坦的“圣战”。“圣战”是每个穆斯林的职责,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来参加解放巴勒斯坦的“圣战”,并要求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对解放巴勒斯坦的“圣战”给予支持。(4)反对任何一种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提议、方案和国际会议。哈马斯认为,巴勒斯坦的主权属于真主,它是不可谈判,也是不可出让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除了“圣战”,别无它途。它宣称,各种关于巴勒斯坦的提议、方案、国际会议都不过是浪费时间。(5)哈马斯认为它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斗争目标接近,但是,它反对巴解组织要把巴勒斯坦建成为一个世俗国家的计划,要求巴解组织完全接受伊斯兰教,放弃其世俗的意识形态。它宣称“只有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朝一日接受了伊斯兰道路,我们才会成为它的战士。”^[2]

哈马斯把阿拉伯人被以军战败的悲惨历史视为信

仰的危机,认为只有由回归本教的穆斯林建立伊斯兰国家才能光复巴勒斯坦,认为只有把人们带回到清真寺、带去做礼拜仪式、进行斋戒、施舍赈济,恢复伊斯兰社会的活力,才会打败占领者。^[3]

从1988年以后哈马斯发表的一些宣言、公告来看,哈马斯除了坚持以上这些观点外,还有进一步激进化的趋势。如在《宪章》中只号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后来的公告中则要求穆斯林起来“杀死犹太人”,并称“圣战”是每一个穆斯林的神圣职责,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开展,等等。哈马斯一方面反对只在巴勒斯坦部分地区建国;另一方面也反对建立世俗国家。亚辛说:“我们反对巴勒斯坦民族宪章,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了建立一个世俗国家的主张,那就亵渎了伊斯兰。”^[4]

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穆斯林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将其奉为国教,在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是全体人民所崇敬的信仰,任何追求伊斯兰化的事业都能获得多数穆斯林的支持或同情。这种顽强的精神和持久的战斗力也在哈马斯等组织那里得到了传承和发扬。对于哈马斯这样奉行原教旨主义、激进民族主义的组织来说,伊斯兰教则既是武器,也是目的。伊斯兰教在广大穆斯林日常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是惟一能鼓舞绝大多数民众的斗志并为之奋斗的思想武器。^[5]因此,哈马斯在渴望拥有自己家园的普通巴勒斯坦民众中有众多的拥护者。

哈马斯成立初期,由于从事大量的宗教宣传和社会福利活动,尤其是注重在中下层群众中发展成员,在清真寺、医院、学校等场合宣传自己的主张,逐渐拥有了较深厚的群众基础,并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80%以上的清真寺。哈马斯的基层组织(布道会)被称为“家庭”。每个家庭有家长和数名到十来名成员,成员彼此以兄弟相称。它通过清真寺、社区服务组织和慈善机构招募新兵、筹募资金、分发物资和指派任务。哈马斯承袭“伊斯兰穆加玛”重视群众生活的传统,开办了不少福利机构,定期资助各类贫困者,对因执行自杀性爆炸袭击任务而死的巴勒斯坦人更是抚恤有加。^[6]哈马斯不仅得到信仰虔诚者和血气方刚的青年的拥护,而且在中产阶级、白领工人,以及专业人员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所以,哈马斯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更不仅仅是由少数持较为极端立场的人所组成的集团,而是成千上万由伊斯兰主义武装起来的信徒构成的抵抗运动。

哈马斯虽然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但它又不是一

个纯宗教的组织,哈马斯的精神资源既有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又有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它的主要领导骨干也不是教职人员。哈马斯反对世俗主义,但并不反对民族主义。它的主张中既有伊斯兰主义的成分,又有民族主义的成分。《哈马斯宪章》提出,“哈马斯认为民族主义是本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7]哈马斯的出现本身是同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1987年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爆发反对以色列占领的起义有密切关系,哈马斯正是适应起义后的形势,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它的主要活动是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抵抗运动。它的宗教理念是抵抗运动的灵魂,也是抵抗运动的精神武器。但它的发展壮大首先应归因于巴以间矛盾的发展,它首先是作为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抵抗运动中的激进部分而存在的。所以民族主义因素在哈马斯的理念中也占有不小的比重。

对巴勒斯坦民族来说,伊斯兰教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不论是在被占领土还是巴勒斯坦自治领土内的人,乃至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人,只要信奉伊斯兰教,那就都是同胞手足。从民族感情来说,广大巴勒斯坦人民始终很难接受与犹太人共同分享领土。所以,尽管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争权夺利,但其打出的反以旗号深得人心。在很多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看来,这是神圣的。这也使得以伊斯兰教义为基础的哈马斯在政治舞台上逐渐获得更广泛的支持。民族与宗教属不同范畴,但在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上,两者之间的关联密不可分。巴以冲突虽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斗争,但也不可忽略其深刻的宗教背景。宗教同民族政治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紧密结合形成了哈马斯的显著特点。一方面其根源于伊斯兰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在实现这一信仰的策略上又表现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这就决定了其斗争策略既有原则性,又具灵活性。

二、哈马斯斗争策略的几次重要调整

以色列1989年起就将哈马斯定为“恐怖主义组织”,开始对其进行压制与打击。事实上,直到1991年,哈马斯才成立了自己的军事组织——卡桑旅。1994年4月13日,哈马斯首次选择了自杀袭击的方式,但随即遭到以色列的残酷报复,从此开始了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进入2000年,巴以和谈僵持不下。当年9月,沙龙在圣殿山的挑衅行动引发了阿克

萨起义,爆发了巴以 10 年来最大的一次冲突,哈马斯走在斗争的前列,这更引起了以色列对它的仇恨。以色列悍然采用军事行动对哈马斯组织进行所谓的“定点清除”,从而引发了哈马斯成员和巴勒斯坦群众的愤怒和复仇情绪。

2003 年 4 月,美国抛出了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首先要求双方停火。哈马斯不仅拒绝这个计划,而且在 5 月 17—19 日连续三天发动三次自杀袭击。以色列也因此加紧对哈马斯的打击。当年 6 月就以导弹袭击哈马斯领导人兰提斯的车辆。2004 年 3 月,以色列越过红线,杀害了哈马斯领袖亚辛。

在以色列严厉打击下,哈马斯第一、二代领导人和多数骨干已遭杀害。同时,在美国反恐战略的高压下,哈马斯境外资产被西方国家冻结,叙利亚也关闭了哈马斯在大马士革的办事处。这使得它的新领导人不得不调整政策,逐步淡化武装斗争的色彩。

1. 转变策略,参加选举,寻求斗争合法化

哈马斯的成员越来越感到加入议会寻求合法化的重要途径。为求生存,哈马斯调整战略,改变态度,2005 年 1 月表示愿意加入政权组织,但不加入政府机构。2005 年 3 月 17 日,在美国的授意下,经埃及政府从中撮合,法塔赫、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及其他 12 个巴勒斯坦小的武装派别达成《开罗协议》,同意将目前针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熄火”(lull)状态延期到 2005 年底并对巴政治体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8]哈马斯坚持在协议中用“熄火”这个词,意味着这种安排具有暂时性和条件性,即停火安排能否持久将取决于以色列方面是否会满足巴方释放其战俘的要求,从而保留了如以色列对其采取行动就可进行报复的选择权。

《开罗协议》不仅标志着哈马斯对巴自治政府和巴解组织传统的立场和态度的重大转变,同时也标志着它对以色列斗争策略的变化。经过四年多艰苦而代价高昂的武装斗争后,哈马斯最终认识到,在国际社会各方压力下有必要探讨一下协商与妥协的可能性。另外,这个长期受叙利亚支持的激进组织也开始逐步接受了约旦河西岸与加沙领导层所坚持的务实立场。再加上又受到此前在 21 个巴勒斯坦城市、特别是在加沙选举中获得较多选票这一事实的鼓舞,^[9]哈马斯一方面要坐享其长期武装斗争的政治成果以谋求多数代言权,另一方面要争取获得在下届立法会的多数席位。它希望这种选举胜利能很快使它在巴自治政府中获得多数席位而且能在决策层中具有否决权,为最终取代

目前巴解在巴自治政府中的领导地位铺平道路。

作为对哈马斯态度与立场转变的回报,阿巴斯答应要在 2005 年 7 月 17 日进行巴立法会议选举前修改选举法,采用一种由选区投票选出半数席位和半数席位由比例代表制产生的混合选举方式,并将这种比例代表制运用于市政委员会选举,以此从体制上消除哈马斯对参加选举的顾虑。同时,各派别同意巴解组织的机构改革以一种确保它能代表巴勒斯坦各派力量的方式进行,并力争使其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2005 年 3 月底,哈马斯正式宣布它将参加 2005 年 7 月举行的立法委员会的选举。他们表示,对加入巴勒斯坦政治框架没有意见,但在与以色列对抗方面不会因此而被捆绑住手脚。

哈马斯答应参加巴勒斯坦立法会议选举,此举表明其已放弃了自 1993 年巴以奥斯陆和平协议以来抵制加入任何巴政府机构的立场。哈马斯对这种变化的解释也并不违背其传统的立场和宗旨,即巴勒斯坦新的选举法体现了与以色列相斗争的一面,而奥斯陆和平协议实际上已走入了死胡同。哈马斯也不否认已经变迁了的地区和国际形势是促成自己进行这种转变的另一个因素。哈马斯参加选举所拥有的政治合法性这一事实,既有助于促使美国和欧盟将其从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中除名这一目的,以缓解自“9·11”事件以来在筹集资金方面所遇到的困窘,还避免了叙利亚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重压下,将其从大马士革大本营驱逐出去的危机。从表面上看,哈马斯仍坚持消灭以色列并在巴勒斯坦的“历史疆界”内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长期战略方针。然而,哈马斯的这次策略调整使其走上了最终能使它与以色列达到事实上的共处这一道路。

2. 施政纲领务实,逐渐向国际社会主流靠拢

在 2006 年巴勒斯坦第二届立法委员会的选举中,哈马斯获胜,赢得了组阁权。而在登上巴勒斯坦政治舞台后的一段时间内,哈马斯的政策也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调整。

哈马斯早在竞选中就提出了“变化与改革”的竞选纲领。长达 14 页的选举纲领几乎包括哈马斯所关注的巴勒斯坦的方方面面。内政、外交、行政改革与惩治腐败、立法政策与司法改革、公共自由与公民权利、教育政策、社会政策、媒体和文化政策、健康与环境政策、财政经济和金融政策等等,都在哈马斯的议事日程当中。^[10]关于内政改革,哈马斯认为,巴勒斯坦的政治制度应该建立在政治自由、多元主义、自由结社、组织选举的基础上,惟有如此,巴勒斯坦才能向着一个团结、

自由、进步的社会发展。哈马斯同时主张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司法审判独立。对于巴勒斯坦民众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哈马斯宣称要打击各种形式的腐败,认为它是削弱民族阵线、阻碍民族团结的罪魁祸首。从这个纲领中不难看出,哈马斯关注的重点是国内改革和政府重建等问题。在此纲领中,哈马斯的宗教色彩已大大淡化,甚至对其长期奉行的抵抗战略也较少提及,而是用大量篇幅突出政府改革、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等问题。

2006年1月哈马斯赢得大选后,其政治主张主要表现在其联合政府的计划草案中。该草案主要由前言和39项具体条款构成。前言主要表达了组建联合政府以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维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尊严的总体目标。在具体款项中,哈马斯陈述了对巴以问题的态度:以色列结束占领、撤离犹太定居点;建立巴勒斯坦国,反对不公正的解决方案;支持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利。哈马斯的上述主张基本上代表了巴勒斯坦内部各派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共同立场。面对国际社会要求哈马斯承认巴解与以色列达成的和平协议的压力,哈马斯在该草案中表明要“与国际社会合作,致力于结束以色列的占领,恢复该地区的和平、自由和稳定;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处理此前与以色列签署的协议”。^[11]这些都显示出哈马斯正逐步地向国际社会的主流靠拢。哈马斯已流露出将最终目标定位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未来的巴勒斯坦国的思想理念,与法塔赫的主张趋于一致。

2006年3月27日,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哈尼亚发表的组阁演说是哈马斯政策调整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哈尼亚声称内阁的大门将永远为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敞开,强调民族团结是哈马斯不变的思想。^[12]与此同时,哈尼亚也多次提到巴勒斯坦被占领的现实,意在提醒其他的政治派别,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团结起来共同保卫家园。“对话、合作、协商”,以及新政府愿与所有的巴勒斯坦派别合作是哈马斯施政纲领中不断传递出来的信息。哈尼亚组阁演说含蓄地承认以色列,巴勒斯坦方面将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未来的国家。为消除以色列和西方的疑虑,哈马斯表示愿与以色列就各项事务进行协商。哈尼亚列出结束被占领状态、维护被占领土的安全,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打击腐败等当前面临的七大任务,并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和前提首先在于政治改革,建立一个奉行社会正义,清正廉洁的政府。哈尼亚特别强调了公民的概念及其在民族团结中的重要性。^[13]

从2006年5月到2007年2月,法塔赫与哈马斯主要是围绕“狱中协议”,进行了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狱中协议”是关押在以色列的各政治派别领导人联合签署的协议,包含承认以色列、建立联合政府的内容。谈判异常艰苦,阿巴斯曾经决定举行全民公决。此举使哈马斯面临两难境地,反对全民公决会失去部分民意,完全同意又会承认以色列。最后双方达成共识,在承认以色列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在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国王的干预调解下,终于达成“麦加协议”。

根据“麦加协议”,即将组建的巴民族联合政府总理将由来自哈马斯的现任自治政府总理哈尼亚担任;副总理将由法塔赫人士担任;哈马斯和法塔赫将分别取得未来联合政府中7个和6个部长职位,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三大关键职位将由独立人士担任。这样的职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权力的相互制衡。可以说,这份协议为组建巴民族联合政府铺平了道路。“麦加协议”的达成,基本完成了消除内部分歧的构想,为重启巴以和谈创造了必要条件。

3. 加沙事件与哈马斯的得失

但在“麦加协议”中双方只是笼统地就新政府的政治纲领达成了共识,并没有就承认以色列和遵守业已达成的巴以协议做出明确承诺。至于说遵守巴以协议,双方在“遵守”和“尊重”两词之间存在严重分歧。

2007年3月17日,哈马斯、法塔赫等组成民族联合政府,但是两派之间的暴力冲突反而愈演愈烈。6月14日,哈马斯从法塔赫手中武力夺取了加沙控制权。随后,阿巴斯解散民族联合政府,组建了由独立派人士任职的紧急政府。哈马斯表示不承认紧急政府的合法性。法塔赫宣布断绝和哈马斯的一切联系,两个政党走向分裂和对抗,双方关系降到最低点。

哈马斯武力控制了加沙后,阿巴斯组成紧急政府,中东问题有关四方表示支持,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也表示了支持。西方国家已经或正在考虑恢复中断了一年的例行援助,以色列则开始分批向巴勒斯坦紧急政府移交约4亿美元的代征税款。巴勒斯坦两派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法塔赫的变化。

由于解散了联合政府,阿巴斯恢复巴以和谈的努力不再受到哈马斯的牵制。2007年11月27日由美国主持召开的“中东和会”,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开幕。中东和平进程中断七年后,再次启动。布什宣布巴以将进行一系列的全面谈判,希望在2008年底达成内容广泛的和平协议。

而同时以色列也加强了其对哈马斯的打压。经过多方斡旋,以色列和哈马斯于2008年6月中旬签订了半年期停火协议,中东地区得到了短暂的相对平静。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哈马斯面临着在中东和平进程中被孤立于局外的危险。

2008年12月19日协议到期后,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起火箭弹和迫击炮袭击;以方以此为借口,发起“铸铅行动”,向加沙发动全方位猛烈的空中打击,随后又发起地面进攻,使该地区局势急剧升温。直到2009年1月18日,以色列军队开始在加沙地带实施单边停火。哈马斯在内的巴各武装派别与以色列停火,持续燃烧22天的加沙战火终于暂告一个段落。

哈马斯之所以主动向以色列发起进攻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美国与以色列对其政策调整的无视并极力将其排斥于中东和平进程之外,哈马斯藉加沙事件重新回到了巴勒斯坦政治舞台的中心。

美国前总统卡特2008年4月21日在以色列议会国防和外交委员会发表演讲,指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已经准备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哈马斯准备与其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卡特认为这是哈马斯政策的“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哈马斯在叙利亚的领导人迈沙阿勒21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哈马斯同意根据1967年6月4日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的边界线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拆除犹太人定居点。他表示,哈马斯拒绝与以色列直接对话,但如果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而这个和平协议又通过了全民公决,哈马斯会予以接受。迈沙阿勒还说,哈马斯可以承诺10年的平静期,以代替其承认以色列。

美国《纽约时报》2008年6月15日刊登的一篇题为《重塑哈马斯和加沙的一年》文章写道:该组织不像它成立之初或者一年前那样激进了。在巴以问题上,尽管哈马斯仍未公开承认以色列,但其领导人曾表示,如果以色列重返1967年边界,同意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建立国家,解决难民问题,哈马斯将宣布长期停火。^[14]此外,还有一些会晤过哈马斯高级领导人的美国人,如美国中东问题高级研究员亨利·西格曼(Henry Siegman)等也表示,哈马斯正在发生真正的变化。2009年3月,在给美国新总统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封信中,亨利·西格曼建议政府“至少应该探索一下与哈马斯对话的可能性”。^[15]

遗憾的是,几乎没有美国或以色列官员认真对待哈马斯的说法和做法。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表态说“哈

马斯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它仍是以色列的敌人”,美国也认为哈马斯在对待以色列以及和平进程上的立场“乏善可陈”,正在科威特参加伊拉克周边国家会议的美国务卿赖斯强调,哈马斯必须承诺放弃暴力,承认巴以之间以前达成的协议等,才能证明它的和平诚意。美国国务院甚至警告卡特不要会晤哈马斯领导人。他们认为,哈马斯愿意讨论停火,只是一种战术。正因为如此,美国和以色列继续对哈马斯采取政治制裁和经济封锁政策,并将哈马斯排除在中东和谈进程之外。

对此哈马斯自然心有不甘,认为只有采取继续战斗一途,才能显示自己仍是中东一股重要力量。在这次冲突中,哈马斯装备不济和协同作战不力的劣势尽显无遗,包括前内政部长赛义德·西亚姆在内的多名高级领导人遭以方“定点清除”,下属基础设施基本损失殆尽。哈马斯虽然损失巨大,却在阿拉伯世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同情和支持。在2009年1月16日举行的多哈阿拉伯国家首脑紧急会议上,哈马斯首次作为巴勒斯坦的代表与会,意味着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有的舆论说它“被以色列炸回到了国际舞台中央”。^[1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哈马斯靠这种特殊方式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三、哈马斯的未来之路

实际上,哈马斯谋求调整政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哈马斯宪章中规定的“圣战”已经不再被渲染和刻意提及,哈马斯现在的宣传材料只是说“抵抗非法占领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力”。又如宪章中规定收复全部失地以及彻底消灭以色列的条款,现在也不再被哈马斯主流派别所认可,包括前政府总理哈尼亚在内的一些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不时流露出“两个国家”的思想,等于含蓄地承认了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事实上的存在。

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的执政,并不代表政治伊斯兰运动在该地区取得了成功。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问题要解决,哈马斯秉持宗教思想,鼓吹宗教教育,试图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路线是明确的,但面对政权极不稳固、巴解组织的世俗力量依然存在、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步步进逼,哈马斯没有理由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而只能寻求与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合作,维持其在巴政坛的既得影响力,为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而共同努力。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民主体制得以维持的前提下,哈马斯的执政,本质上反映的是巴勒斯坦

人民近年来对和平屡屡不能实现的失望,而非对政治伊斯兰运动的热衷。

对于多数巴勒斯坦人而言,宗教只是手段,不是目标。只要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哈马斯以伊斯兰为旗号的武力抗争就一定会继续得到来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大力支持。尽管哈马斯与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其它激进宗教团体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阿拉伯世界内部的世俗政权也对它充满戒心和疑虑,^[17]但哈马斯能够顶住美国和以色列的封锁而在加沙艰难地维持政权至今,说明哈马斯是得到了相当多的巴勒斯坦人支持的。

哈马斯的政策调整是内外压力的结果,也是中东形势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使然。从一个游离于政坛之外的激进势力,跃升为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第一大党,哈马斯角色的转变不但意味着拥有了较大的权力,更赋予了它更多要承担的责任和不可推卸的义务。而为了改变内部与法塔赫的反目成仇,外部面临西方国家空前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寻找到一条既能坚持哈马斯原来的宗教原则,又能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的道路,是哈马斯所面临的最急迫的任务。而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哈马斯的几次大的策略调整都在不放弃其宗教原则的基础上完成了其政治目标,相信在未来的中东和平进程中,哈马斯会在宗教与政治的平衡中继续完成自己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使命。

[注释]

- [1] Jeroen Gunning, *Hamas in Politics: Democracy, Religion, Viol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8.
- [2] Yonah Alexander, *The Annual on Terrorism, 1988-1989*, Springer Publishing, 1990, p. 102.
- [3] Beverly Milton Edwards, *Islamic Politics in Palestine*, London, 1996, pp. 184-185.
- [4] Ziyad Abu'amr,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n The West Bank*

And Gaza: Muslim Brotherhood And Islamic Jiha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71.

- [5] 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M], 东方出版社, 1995年版, 第175页。
- [6] Michael Irving Jensen,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Hamas: A Grassroots Perspective*, I. B. Tauris 2009, p. 127.
- [7] Barry Rub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lestinian Politics: From Revolution to State-build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22.
- [8] “The Egyptian initiative for a lull in the fighting”, IICC Reports, May 7, 2008, <http://www.rightsidenews.com/globalterrorismarchives/theegyptianinitiativeforalullinthefighting.html>.
- [9] 安惠侯:《巴以和平曙光再现,和平道路仍然曲折艰难》[J], 《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2期。
- [10] Hamas—2006 Electoral Campaign Platform “List for Change and Reform”, <http://israelipalestinian.procon.org/viewadditionalresource.asp?resourceID=000646>.
- [11] *Palestinian 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Platform* (March 20, 2007),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s/Peace/PaNUplatform.html>.
- [12] Cabinet Platform of Hamas, 转引自李志芬:《哈马斯政策的变化及对巴勒斯坦政局的影响》[J], 《西亚北非》2008年第2期。
- [13] Khaled Hroub, “a ‘New Hamas’ through its New Documents”, *Journal of Palestinian Studies*, Summer 2006.
- [14] Ethan Bromer, “A Year Reshapes Hamas and Gaza”, *New York Times*, June 15, 2008.
- [15] Bryan Bender and Farah Stockman, “Top officials urge dialogue with Hamas”, *The Boston Globe*, March 14, 2009.
- [16] 李伟建:《哈马斯:被以色列炸回国际舞台中央》[N], 《新民晚报》2009年1月9日。
- [17] 王联:《试析穆斯林兄弟会与哈马斯的成立》[J],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

作者简介:郭依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讲师。(北京,100024)

收稿日期:2009-06-30

修改日期:2009-08-29

50 Overview of Researches in Marx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System

by Sun Wei & Zhang Senlin

When viewed as a whole,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in Marx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system,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nd perspectives in research. We should strengthen research on Marx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system. Such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accumulation of work on special topics,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nt system and should persevere in using the Marxist stand, viewpoint and method to carry on the research.

World Economy

55 A Way of Viewing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by Peng Long & Ren Kangyu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sub-prime debt crisis in the U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width and depth. Not only in the financial area, but also in real economies, all the countries are experiencing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f the crisis, which include the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newly emerg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is to inquire into the reasons of the crisis, by focusing on the problem of 'Global Imbalance'. After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Imbalance of Payments and the predicted crisis arising from it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deals with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crisis. The second part is to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ent crisis and the imbalance of BOP. The third part is to make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especially for China and to make a conclusion.

60 "G3": Analysis on Interaction Mechanism among China, the US and the EU under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by Li Jiguang & Zhang Hanli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is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now. The establishment of "G3" can be helpful to solve various problems facing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G3" mechanism is the demand of remedying structural defects of Doha negotiation, of joint response to challenges of protectionism and regionalism and of breaking bilateral negotiation puzzles. The "G3" mechanism has had a good foundation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factors: the same common interests, the recognition of such a need by the US and the EU, and also China's feeling of urgency and its growth of capability.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pecific mechanism in the end.

Countries and Regions

66 Th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amas and Its Strategic Adjustments

by Guo Yifeng

Hamas is an organization tightly combining politics with religion, and its strategy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Islam but also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peace process between the Palestinians and the Israelis. Hamas adjusted its strateg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especially after the victory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in 2006. Hamas will continue to adjust its strategy to adapt to the complex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72 Sri Lanka in the Post-LTTE Era

by Liu Jun

Sri Lanka is currently facing good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multiple challenges after the defeat of LTTE. Good opportunities include the attainment of peaceful environment which gives impetus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moval of main obstacles to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and the possible reduc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spending. The delayed process of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the slow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Northeast, the complexity of the refugee problem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relations with western countries compose the main challenges which Sri Lanka is facing. Complex situations of party politics, narrow-minded nationalist sentiment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return of LTTE will give the government of Sri Lanka a severe test.